

Assignment Shanghai: photographs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

内战结束的前夜

——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镜头下的中国

[美] 杰克·伯恩斯 摄影
吴阿融 译

纪实影像

从这些照片中
看不到战火和硝烟
战争背后
普通人和他们不安的日常生活
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终结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ssignment Shanghai:
photographs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
内战 结束的前夜

——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镜头下的中国

[美] 杰克·伯恩斯 摄影
吴呵融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Assignment Shanghai: photographs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London, England

© 2003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otographs by Jack Birns/*LIFE*. © Time Inc.

Edited by Carolyn Wakeman and Ken Light;

Foreword by Orville Schell.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4-1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战结束的前夜: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镜头下的中国/
(美)伯恩斯摄.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温故影像)

ISBN 7-5633-5129-9

I.内… II.伯… III.社会生活-史料-中国-
1945~1949-摄影集 IV.K266.0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09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787mm×1092mm 1/18

印张:9 字数:25千字 图片:102幅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美】杰克·伯恩斯(Jack Birns)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在中国内战的最后几年被派往上海进行战时报道。

1947年，当杰克·伯恩斯作为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被派往上海的时候，正值中国内战时期。上海这座曾经繁华的国际都市正处于贫困、腐败和混乱的包围之中。不顾杂志出版人亨利·R·卢斯的反对，伯恩斯将他的老相机聚焦在战乱中的普通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上，他在极其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拍下了难民、乞丐、儿童、妓女、士兵以及贫富悬殊的生活、街头的行刑和市民的反抗。但当时这些照片许多都未获准发表。50多年后的今天，它们终于首次得以出版。今天看来，伯恩斯拍摄的这些反映战乱中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照片绝不普通，它们以静态的视角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转折。

◀封面故事 撤退的国民党士兵等待转移。一位妇女抱着自己的孩子坐在货车车厢里，身上穿着别人捐给她的军服。(1948年11月，浦口)

内战结束的前夜

——美国《生活》杂志记者
镜头下的中国





雙魚
汽水
價不銷不 造聚包純

天隆被單

場影電覽有
團劇聲天團劇聲大
廣文郎 會芳羣 團劇芳團 團丹狂 社聲新
劇代楊 奇奇笑 怪奇越 團坤乾 錄亞王 濟利費

記
界世大

飛
泉福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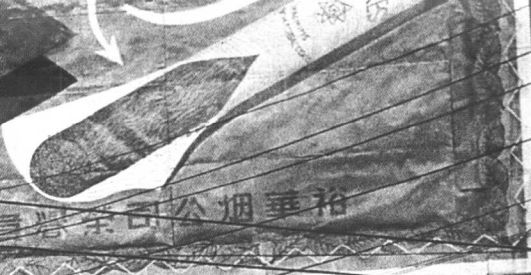
星
三
國
美
中
美
中
美
中

昌茶
店商果梅

客遊
場
票售

地





毛巾

救民

慶肥皂

司公香潔祥嘉華

廠業工學化治歐 品出 汚除點點

抗滬京 華全司他信華 製會員委務副

場劇大坤乾
團劇 樂永 團劇 雲子
團子童 團劇揚維 山中趙 娃娃大
哈笑 英彩米 俠菊揚 亭少于 團楊田

巾毛 414 鐘 大買 國中
品出司公通製

火林許米 列不劇象序順

經銷各廠皂燭火柴
專營各種捲煙大戶
辛中大

行煙華

有煙



英文版编者致谢

——卡罗琳·韦克曼 (Carolyn Wakeman)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和亚洲研究副教授

——肯·莱特 (Ken Light)

加州大学伯利分校新闻学研究生院摄影中心主任

本书的成功出版，是与许多同仁的努力和贡献分不开的。首先，我们要特别感谢本书的摄影师杰克·伯恩斯(Jack Birns)及其夫人哈丽特·伯恩斯(Harriet Birns)。为了进行采访，我们曾多次登门叨扰。感谢他们的热情接待，以及在不厌其烦地回答诸多问题时所给予我们的耐心。感谢罗伊·罗恩(Roy Rowan)用他那老新闻工作者独具的洞察力和敏锐的记忆力，帮助我们对这批半个世纪之前所拍摄的照片进行了精心的甄别和挑选。

感谢汤姆·英格尔哈特(Tom Engelhardt)为我们贡献了其眼光独到的编辑判断力和鉴赏力。感谢克尔顿实验室(Kelton Labs)的列斯利·舍利尔(Leslie Sheryll)帮助我们把这批陈旧然而却非常重要的老照片制作成崭新的印刷品。同时，我们也感谢加州大学出版社那些天才的编辑、设计和生产人员对我们所提供的指导和支持。他们包括：詹姆士·H. 克拉克(James H. Clark)、希拉·列文尼(Sheila Levine)、罗斯·维柯尼(Rose Vekony)、诺拉·伯格(Nola Burger)和安托尼·克罗奇(Anthony Crouch)。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没有《时代》有限公司的凯西·道克(Kathi Doak)以及专业顾问彭尼·黑斯(Penny Hays)，这本书是根本无法诞生的——是他们帮助我们找到这批尘封已久的照片。

像以往一样，我们还要感谢苏西·汤普金斯·布尔(Susie Tompkins Buell)对加州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和本书所提供的慷慨赞助。最后要感谢的是玛兰尼·莱特(Melanie Light)和罗伯特·蒂尔尼(Robert Tierney)，由于其耐心和明智的指点才使这个项目完成得更为轻松。

序言

——奥里维·谢尔(Orville Schell)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研究生院院长

有如用长纪录片中精选的镜头来构成一部短系列片一样，《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杰克·伯恩斯用他所拍摄的这批照片，将中国历史的一个时期定格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得以看到一座伟大的城市——上海的许多掠影。看到它在20世纪40年代末那场政治革命风暴中的各个侧面。

本书所收集的照片，属于20世纪中叶特别风行的一种黑白文献照片的流派。在当时的《生活》杂志里，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它的创始人有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亨利·卡蒂尔-布雷森(Henri Cartier-Bresson)、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garet Bourke-White)、韦恩·米勒(Wayne Miller)、卡尔·迈登斯(Carl Mydans)、英格·莫拉斯(Inge Morath)、科内尔(Cornell)以及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他们把坚忍不拔、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与敏锐的洞察力和优雅的创作灵感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一个遥远的世界呈现到美国人的家里。有幸的是，当时的美国人尚未被随后而来的四处充斥的电视影像熏陶得麻木不仁。

当时，期刊杂志的出版尚未变成被任意填塞乌七八糟内容的大杂烩，《生活》杂志不仅培育了一批在当时也许是整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摄影家，同时，还组织他们与一批同样伟大的作家共同参与了一些项目。这批作家有：约翰·赫西(John Hersey)、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 White)、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等。然而的确，这些项目——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新闻学的所谓“太平盛世”——其实是经过亨利·R·卢斯(Henry R. Luce)的《时代》-《生活》-《财富》王国(以及它所代表的所有政治势力)严厉审读后的产物，而这批卢斯所聘用的新闻工作者，只不过是他的督导下完成了一些独特而罕见的常常是出色的作品集而已。

杰克·伯恩斯是《生活》杂志里那群训练有素的摄影记者中的一员。他在中国所

拍摄的这批照片在《时代·生活》的库房里静静地躺了半个多世纪。其中许多照片是反映当时一些日常生活情况以及普通老百姓，如工人、乞丐、警察、妓女、士兵、政客以及难民的。其他的一些照片则记载了中国那场内战所引发的社会剧变。

在50多年之后的今天，重新挖掘整理和审视这批照片，我们将发现，它们已经具有了新的含义，这是只有历史才能赋予的新含义。它们不仅让我们看到50多年前上海的模样，而且还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当时的战争、贫困、腐败、堕落和混乱，最终会变成使中国共产党生长和壮大的沃土。

同样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刚刚经历过的那个充满矛盾斗争和巨大变化的世纪来说，这批照片成了意义重大的警示物和纪念品。的确，上海本身有着特色鲜明的四个阶段，如果没有一些持久不朽的、有形的里程碑来充当延续历史的环节，那么外人是很难理解这个城市故事里各个章节的逻辑性的。

在19世纪末，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是一个四分五裂、毫无自卫能力的弱国，几乎遭到了所有列强的劫掠和蹂躏。当时的上海，只不过是长江边一块死气沉沉的乡土之地。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逐渐变成了远东地区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变成了一个世界文化、商业和政治的中心。

1949年，上海再度被理想化、神圣化。这一次它受到翻天覆地的震撼，变成了一个坚忍不拔的、“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孤独的无产阶级堡垒，成为中国那场极具挑战性和充满自豪感的革命的一部分。这场革命遏止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势头。在振奋人心的共产主义理想鼓舞下，毛泽东所憧憬的上海并非是一座繁华的都市，而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战斗堡垒。

然后，1978年，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再次发生了剧变。上海开始放弃其革命性的个性，对外开放了。

在每一个历史转折阶段，上海的个性总会发生彻底的、脱胎换骨的变化。《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杰克·伯恩斯坦站在其中一个转折的制高点，抓住了其特性。当时的上海正从一块半殖民地贸易、文化和阴谋的“牛排”，蜕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

本书所收集的丰富多彩的图片，为上海历史中那充满戏剧性的时刻，为美国新闻学中一个与众不同的时代，为这位出色的摄影家都树立了一座丰碑。但它同时也为美国在20世纪那极其鲜明的变化树立了纪念碑。

作者前言

——杰克·伯恩斯(Jack Birns)

1946年，我开始以签约的自由摄影师身份在洛杉矶工作，几乎是看到什么拍什么。《生活》杂志社有时也会聘请一些尚无名气的摄影师来拍摄一些大摄影家们不屑一顾的小题材。我正处于饥渴状态，所以干得很起劲。6个月之后，我创了自由摄影师业绩的记录，于是愉快地接受了到中国进行采访的派遣，虽然并非毫无顾忌。一想到自己可能在这个重大题材的任务中失败，我就寝食难安。在与《生活》杂志洛杉矶分部的头头杰克·比尔伍德(Jack Beardwood)会面时，我真有点战战兢兢、惶惑不安。但他对我说：“如果《生活》杂志社认为你不能胜任此项使命，他们也不会选择你。”尽管如此，在我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个声音在发出自嘲：“OK，能干的家伙，你认为自己的确能干好它吗？”

直到我在上海安顿下来之后，我才弄清楚，我的新闻报道范围不仅包括诸如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溃退之类的中国内战的热点新闻，还包括五六个东南亚国家的起义和暴动。我将与《生活》杂志上海局的负责人、记者罗伊·罗恩(Roy Rowan)共同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给予我们鼓舞和动力的，是我们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总在期待一定能报道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新闻故事、一条能引起轰动的好新闻；一定能借此在竞争中打败该地区的所有其他媒体。甚至，我们也许还可以得到更美好的结局——击败《生活》杂志的其他记者，占据更多的版面。正是由于我们俩的完美追求和不懈努力，罗恩和我才能做到在任何一个我们去采访的东南亚国家，都在新闻领域里占据着令人垂涎欲滴的领先地位。

50年前的中国，真是个好不好采访的地方，尤其当你是个不懂汉语的外国人时。电



伯恩斯的照相机。(1947年)

话很不好使，好不容易拨通之后，你却往往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我们与所有人的沟通都必须通过翻译来进行，而他们有时会自作主张地随意更改问者的问题和答者的回答。无论他们曾受过多么良好的教育，出于多么真诚的善意，这些翻译对于什么是新闻，以及美国人对新闻会有何种反应，是毫无概念，一窍不通的。他们也根本不懂处理突发新闻的紧迫性。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种的困难、时刻都会面临的各种危险，以及与妻子和我第一个儿子的分离，统统都让位给用采访到的纪实材料编制成各种新闻时，所获得的振奋及愉悦。

日子漫长而难熬，我们从日出干到午夜。伙食也很简单，逮着什么吃什么，有时候就向街头小贩卖些烤红薯充饥。交通也很困难，我们只能依赖美国空军战争公积金项目提供的C-46和C-47型运输机飞行。驾驶它们的则是些“老油条”。他们开起飞机来随心所欲，经常出现一些把人吓得毛骨悚然的险情。有一个家伙吹牛说，他醉的时候开飞机比清醒的时候开得好。所以，他经常在飞行前喝得醉醺醺的。运输机其实就是空中货车，我们只能坐在一袋袋面粉、邮包或者装着上千条30毫米口径机关枪子弹带的木箱上。尽管如此，我们在旅途中付出的种种艰辛还是很值得的。在1948和1949这两年，伯恩斯和罗恩小组在《生活》杂志上一直保持着版面占有率的最高记录。

在中国，拍摄条件也是十分艰苦的。“满洲”零度以下的严寒和华中华南潮湿得令人窒息的气候，对摄影器材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使它们常常难以安装、难以正常操作。在上海，有一个来自欧洲的、无国籍的家伙知道如何拆装摄影器材，可惜对于我带去的禄莱(Rolleiflex)和康泰克斯(Contax)这两种相机，他却缺乏专业经验。我唯一

能做的，就是祈祷上帝保佑，让我的摄影器材在成千上万次暴露于恶劣气候之后仍不散架。要知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可是美国杂志派驻中国的，肩负着提供整个东南亚地区新闻这一艰巨重任的唯一摄影记者啊！我很清楚，自己的任务就是替所有的美国人充当他们在这一地区的眼睛。

本书中有大部分照片并不属于指定要我拍摄的范围，它们也从未获得刊登的机会。《生活》杂志的编辑们将它们弃之不用，也从不说明原因。而在我来说，我自己的目的只不过是客观地记录下一个饱尝战争之苦的民族，记录他们极度艰难的日常生活。从1900年义和团起义到1947年的国内战争，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已被战争煎熬了将近半个世纪。然而这些记录日常生活的照片却被认为毫无新闻价值，对于它们的不获出版，我懊恼万分。但我很清楚，处在洛克菲勒中心的人们与处在上海的我，二者的观点是不可能一致的。这毕竟是他们的杂志，不是我的。我只管拍我的照片，而他们则只管作他们的选择。

在我和罗伊·罗恩所作的现场采访中，有过关于一群悲惨而顽强的穷人在上海沿河的码头区偷抢棉花的事件。这是一群从郊区逃到上海找工作的、一贫如洗、从没受过教育的难民。我亲眼看到这群人，男女老少大约40多个，突然冲上一艘大货船。那上面装载着价值2000万美元的棉花，这是联合国为了让农村的穷人能穿上衣服而捐赠给中国的救援物资。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到船上，扯开包装袋，疯狂地哄抢一簇簇的原棉，然后拿去与棉花贩子换铜板。政府只得把残存的那点棉花装到车上，实际上只有一部分救援物资能运到内地。我们所拍摄到的，是一个板着脸的警察逮住了一个农妇，并对另一个年轻女子进行搜身的过程。诸如此类的照片当然没有反映什么政治事件，只不过记载了一些日常生活的景象而已，杂志社是不会刊登的。

一个摄影记者，当他在抓拍照片时，是无法奢望能够表达自己的同情心的。但是，许许多多类似的悲惨画面都深深地烙刻在我心中，令我永志难忘！有一次在我拍摄一个慈善机构到医院和大街上去收集儿童尸体的情境时，我的心头充满了悲哀。还有一次，我拍摄了一场街头行刑的过程。它使我不仅感到愤怒、厌恶，而且还极端恶心。最后，三个被处决的人倒在肮脏的土路上，围观的人群也作鸟兽散。这时，罗恩和我才找到一间小酒吧，每人要了两杯双料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大口大口地牛饮起来。但这反倒使我的胃感到更加难受。

还有些时候我是处于恐惧状态的。有一次的经历更令人揪心，说起来都会叫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1949年5月17日凌晨2点39分，那是美军撤退的最后时刻。我登上了上海龙华军用机场里那七架美国货机中的一架。当时，如果共产党军队的机枪手射中领航机，或者直接射到机场跑道的話，毫无疑问我们全都会葬身火海。万幸的是，“红军”（the Reds）尚未带着武器及时赶到。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飞机终于安全起飞了，但这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离开中国的方式。

在一场战争中，通常你只能在敌对的双方中报道一方，但在那段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坦率地说，我只是深深地同情中国的老百姓。在当时我尚未意识到，有朝一日我这些有关中国内战的照片会成为对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真实记载。

许多照片从未被披露过，我希望它们能向今天的读者们静静地诉说。

内战结束的前夜

Assignment Shanghai photographs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



学生游行示威。(1948年6月,上海)

导言

——卡罗琳·韦克曼 (Carolyn Wakeman)

当杰克·伯恩斯刚刚与《生活》杂志社签约，被派到中国去采访正在扩大的内战时，他的心里是忐忑不安的，不知道自己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是否能顺利地完成任务。他当时年仅28岁，从未出过国，也不认识任何对中国拥有第一手经验的人。对于他来说，上海是那么的遥远、陌生，似乎随时都会遇到危险。在那个地方，“人们说着陌生而可笑的语言，吃着古怪而可笑的食物，甚至还会对外国人‘茹毛饮血’”。

这是他在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中所写的话。在登上那艘破旧的美军USS蝰蛇号运输舰，准备在狂风暴雨的太平洋上开始为期3周的艰苦航程之前，他把一支史密斯和韦森 (Smith & Wesson) 的38毫米口径警用左轮手枪悄悄藏在船舱的床头柜里。伯恩斯本来就干得不错，他凭自己的努力已经打进了《生活》杂志精英摄影记者的圈子。1947年12月15日，他住进了上海百老汇大厦酒店的套房里。在凝视窗外的城市夜景时，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做好这次在中国的采访报道工作，把任务完成得漂漂亮亮的，超过以往所有的人。

伯恩斯是1947年2月成为《生活》杂志社签约摄影师的。在此之前，他曾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在洛杉矶辛辛苦苦、没日没夜、没有周末休息地干了1年多，为《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矿工》(Colliers)、《红书》(Redbook)、《时代》(Time)和《财富》(Fortune)等报刊拍摄和报道好莱坞的种种故事和传闻。6个月之后，他在《生活》杂志创下30个页码的刊载记录，同时有一幅照片还被用作了封面。总编辑威尔逊·希克斯 (Wilson Hicks)发现了伯恩斯的才能和干劲，把他召到纽约，委派了他这个颇为光荣的出国采访任务。“我们有许多写手，杰克，”他说，“但你是个

新闻摄影记者，我们要把你派到中国去。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快手’——能够很快地进入现场，马上抓拍到东西，然后迅速把照片发回来。”

在20世纪40年代，《生活》杂志的发行量已高达500多万册。在那个时期，《生活》杂志成了新闻的“黄金时段”，成了政治和历史可视资料的重要来源。在那个尚无电视的年代，这份极其畅销的周刊为美国人提供了最具影响力的图片。在轻松介绍欧洲王室或异国农民生活的同时，也刊载报道战争、起义或暴动的“刚性”图片，从而使读者获得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感受。煽情的照片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让他们看到许多反映达官贵人、凶杀罪犯、奇人奇事以及民俗民情的精彩图片——从贝蒂·格拉布尔(Betty Grable)的万种风情，到堪萨斯州的龙卷风，或者黑寡妇蜘蛛的生命周期。“观察生活，了解世界，关注重大事件；目睹穷人的愁容和上流人傲慢的姿态；发现奇特的事物——机器、军队、芸芸众生、丛林中的阴影和月亮上的阴翳。”这就是《生活》杂志那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办刊宗旨。自从1936年创刊以来，《生活》杂志一直将一批雄心勃勃、才华横溢的人才牢牢地凝聚在自己的麾下。

斗志昂扬的出版家亨利·R·卢斯(Henry R. Luce)当时已经凭借《时代》、《财富》杂志和每周新闻短片《时代在前进》(March of Time)创建了一个强大的传媒王国，而《生活》则是他又一个新的尝试。这份杂志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格大胆的期刊模式：它在严肃的社会时事和长篇的配图论文之中，点缀上一些轻松有趣，有时也是感人至深的图片。它还将编者的评论与新闻报道结合起来，以提升和扩大时代集团那保守的、沙文主义的价值。为了阐明自己所提倡的“一个美国的世纪”这一观点，卢斯选择了1941年2月份那期《生活》杂志的一篇社论，来传播他的这一观点。他那充满煽动力的言语使得美国人“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我们的责任和机会，认定我们美国就是全世界最强大、最举足轻重的民族，因而赞同为了我们认为恰当的目的和运用我们认为恰当的方式，向全世界施展最全面、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卢斯这位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长老会传教士之子看来，在战后的年代，最应该施以美国影响力的地方就是中国。

卢斯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也是个坚定的共和党人，他曾先后7次将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照片刊登在《时代》杂志的封面。因为他认为，只要给予足够的支持，美国二战时期的这个盟友不仅能够操纵和保护中国的命运，还可以抵挡共产主义在亚洲